美国史学界关于
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

贾　宁

美国史学界公认1644年由满族入关所建立的清朝在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统治盛世期间，把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阶段代表着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对这一成就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中国的政府和社会在受到西方干预之前内部发展的最后动力。

清代早期的显著功绩之一，是对蒙、回、藏边疆地区的经营。清代的边政措施决定性地影响到现代中国的疆域规模及其民族组成，是历史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相连接的重要环节。然而就对清代的整体研究而言，美国史学界曾长期只注重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70年代才开始改变这种状况。随着对清代早期整体研究的深入，美国的清史学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清代边疆学的研究再忽视下去，则无法对清朝盛世作出全面的认识和解释。自80年代以来，对清早期边疆问题的探讨在美国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至今已成为一门令人瞩目的新兴学科，并被普遍视为有广阔的开拓及发展前景。在此，对这一领域中美国近年来研究新发展的几项重点加以介绍，希望能促进与国内学者在学术上的沟通与交流。

美国的清史研究在60和70年代中，曾零星出现过对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专著或文章。虽然这些专著和文章未能形成80年代以来的研究规模，但其作者的学识、见解和高质量的分析论断，都对新一代的边疆学者们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John Fairbank（费正清）编辑的《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的数篇文章；David M. Farquhar 1960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清代至19世纪对蒙古的管理》The Qing Administration of mongolia up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及Joseph F. Fletcher的文章“1880年前后的中国与中亚”，等等。在这一代学者之前几乎是在美国独创中国边疆学并于40至50年代有众多著述的Owen hattimore（1901－1989）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力。80年代以来，随着清代边疆学的日益发展，对hattimore见解的回顾和重新探讨也显得越加重要。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美国清代边疆学群体以年轻的博士毕业生为主体。他们的研究多方面推动着清代边疆学向更高层次发展。根据他们的研究，解释清代边疆事业的成功，除要发展入关前满蒙关系，入关后满汉关系，及清廷对蒙、回、藏政策这些传统专题外，还应以新的角度，审视更深层的原因，如：为何在满族统治时期中国的边疆事业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功；清政府如何调整政府机构使之能够有效地对边疆进行管理；从清代边疆的实践如何理解边疆与内地、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关系，等等。

目前美国清代前期边疆学群体主要代表人物及他们博士研究专题是：Pamela K. Crossley在1983年于耶鲁大学完成的《孤军》（Orphan Warrior）；本人在1991年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的《清代前期的理藩院》（The Lifanyu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Mark Elliot（欧立德）在1993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的《外乡客：1760年以前内地的八旗》（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èrience in China，1644－1760）；James millward（米华健）在 1993 年于斯坦福大学完成的《1759 至 1864 清朝经营下的新疆贸易和民族关系》（Beyond the Pass：Commerce，Ethnicity，and the Qing Empire in XinJiang，1759－1864）；Phitip Foret（傅雷）在 1993 年于芝加哥大学完成的《清朝的风景大事在承德》（Marking the manchu handscape at Chengde.）

这个群体本身似乎人数并不多，但对他们研究项目的关注和参与在史学界是空前的。其表现有如下方面。一、研究汉族社会颇有盛名的上一代学者转而研究清代边疆问题，如匹兹堡大学 Evelyn Rawsky 对清代关内外满族以及对蒙古社会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 Peter Perdu 对清代新疆的研究；等等。二、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愿意选择清代边疆题目作研究、写论文。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清代边疆研究的中坚力量，促进此群体的扩大。三、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清代以前非汉族政权研究史等各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参与到清代边疆的研究之中，扩展着此专题研究的角度和深度。比如 1994 年夏季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赞助了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为期五周的清代承德避暑山庄暑期研究班，目的是以承德为基地，以藏传佛教为重点，研究承德如何成为边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汇集地。此研究班在众多的报名者中录取二十二名，他们的专业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他们计划出版的专辑将是综合性很强的著作。四、90 年代初清代边疆研究开始进入了美国大学本科生亚洲历史教育课程之中。清代边疆学者正力图改变中国史教学中只讲汉族或中原历史、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的状况。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美国本科生的中国史及亚洲史教学会走向一个新阶段。这种中国史教育方式的变化除能改变普及教育的知识结构外，必然长远性地加深未来清代边疆学学者的功底及研究程度。

对于美国史学界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本文就如下三方面加以重点介绍。

一、清代满族的文化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所决定的清廷统治方式

满族自身的文化属长城外游牧或氏族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清廷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程度高于任何其他民族。这一点被公认为清政权的统治比任何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都长久的基本原因。然而入关后清廷较高程度的汉化并不意味清朝的统治完全是汉族式的统治。美国学者对清代满族的研究越来越充分地展示，清廷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满族文化传统，早期清代皇帝中，特别是乾隆帝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突出。清廷在政府中置满族官员地位高于汉族官员，以八旗组织形式区别于汉人的组织形式，禁止满汉通婚，并保持和尊重自己祖先的氏族文化和礼仪，以此与汉文化保持距离。清朝廷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地位决定了其怀柔四方的统治效力，把截然有别的长城内农业文化与长城外游牧文化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处于美国清代边疆学研究领导地位的 Pamela K. Crossley 从历史上长城内外各政权互相影响的政治史角度，阐述清朝对疆域空前的帝国的治理。她指出，自秦汉以降，长城内外各政治势力就处于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能动相互作用之中。中华帝国传统不断完善的过程与氏族政治传统不断的成熟同步并进，唐朝就显示出两种传统相结合的趋势。清代前期的皇帝把两种传统的结合推向高峰，他们既是中国的至上贤君和至尊天子，又通过八旗制度在游牧民族中保持"汗"的形象。以乾隆帝为代表，这种普天共识的无上皇权是清朝跨长城而治的根基。

在保持与汉文化距离的同时，清朝廷必须证明满族统治整个帝国的合法性。在此问题上 Crossley 强调，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在对汉文化接受程度加深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自身传统文化

日益疏远和淡漠。以 1783 年乾隆帝钦定《满洲源流考》为标志，满族统治者把他们与汉文化及汉族政治制度相冲突的氏族文化及制度(包括祖先与其后裔的血缘递承、神话传说、氏族历史和萨满教等)以汉文化的方式修饰并加以文献化。以其记录并保持满族文化为目的，这种把满族氏族传统以汉文式文献化的步骤成为一种政治措施，以确立满族文化传统在汉族主导社会中的合法及合理性，申明满族管理中国之天经地义在于即使起源于非农业文化的氏族传统，满族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从未脱离中国历史各朝代发展的基本模式。Crossley 这项研究向我们展示，在乾隆帝眼中，农牧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不能妨碍清朝跨长城统一而治的事业。内地边疆一体因之有了理论根据。

Crossley 进一步指出，清朝朝廷一方面用汉文化文献化的方式证明满族文化传统在汉族社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并不否认他们祖先的非汉族渊源，并在这种文献中证明蒙、藏、维、汉等各族都有自己的祖先在创立和发展统一的中国的事业中相互关联。清朝皇帝便由此成为各种文化的衔接点，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同文化的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

关于清代满族的文化地位，不少学者特别从满族与蒙古族的历史联系加以论述，他们指出，满蒙两族在语言、文化、政治概念、宗教信仰(萨满教)和风俗习惯上紧密相连，满族的历史发展与蒙古族密切相关。密切的交往和精神生活的类似，使满族非常熟悉蒙古族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 1599 年满文创立以前，满族从蒙古族那里得到从汉族引进的政治概念，如“国家”、“统治者”、“皇帝”、“纳税”等等。这些政治概念的施行已在蒙古社会按其民族习俗加以修正。因而 1644 年入关后清廷所保持的满族传统仍属长城外游牧文化范畴。

早期清朝皇帝中，康熙和乾隆帝是既精通汉文化又保持游牧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汉族和长城外各族人民中都有极高的威望，各族人民都以自己的文化方式和政治理解接受他们的统治地位。因而作为多元文化的代表者，清朝皇帝有能力维系各族人民在庞大的清帝国中的统一。他们在长城内巩固着对汉族社会的治理，在长城外对蒙、回、藏各族产生了相当的向心力。我们在充分估价清廷满族汉化的进步作用时，对他们保持其游牧文化传统于形成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也不可低估。

二、清廷对传统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改进

清代边疆事业的成功，与清代朝廷对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改进不无关系。中国历史上两大长城外民族入主中原治理整个帝国的元代和清代，都对汉族所建立的中央政府机构加以扩充，创立对非汉族地区与社会的直接管理。元代的宣政院和清代的理藩院是这种扩充的结果。理藩院比之宣政院地理上有更广阔的职权范围，行政上有更繁多的管理功能，在中央和边疆地区的关系上有更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同意香港学者 Adam YuenChung hui 的观点，清代理藩院(同时还有内务府)属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无先例的新机构。

美国中国学的开创者 John K. Fairbank 曾经指出，18 世纪清朝的领土和人口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管理的能力与稳定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至高点。本人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蒙、回、藏地区是清代中国领土发展的重要源泉，为此，清廷在中国政府内设立了理藩院。我们要想理解清政府对空前疆域统一管理的能力，就必须对理藩院有所研究。然而美国清史学界在 1991 年以前还未见对理藩院的专题探讨。本人的博士论文涉足于此空白领域。

理藩院研究在方法论上涉及如何研究政府机构发展的历史。考察类似理藩院这样的政府机构，并非只研究与这种机构相关的朝廷政治制度，或列举出这种机构对地方管理的政治功能。作为一种跨文化、跨经济形态、跨民族社会的管理机关，理藩院的历史在清代前期从政府管

理的角度代表着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内地、边疆经济发展史。

理藩院研究在理论上，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之关系和社会中心区与边疆区之联系。以长城为界的边疆、内地之分既是由文化、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打破这些界限所形成的统一，就必然基于政府跨文化、跨经济和跨社会形态而治的能力。理藩院是清廷获得如此能力的重要机关。对理藩院在行政管理、朝廷礼仪、宗教事务、文化沟通、经济规划诸方面功能进行分析后，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前期中心区与边疆区的大统一，并非仅是政府政治或军事强制的结果，也是清代朝廷通过理藩院实施多项边疆政策的结果。

理藩院对各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主要通过对蒙古地区的八旗制，对新疆南部的伯克制，和对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理藩院的管理职能包括任命地方官，发放薪水，规定职权，约束职责，颁发政令，监督法律、维护生产、决定赏罚等等。这些职能把长城外各族领导阶层纳入清朝的官制系统，使之成为中央政府的地方官，由此建立并巩固了中央与边疆地方的直接行政联系。由理藩院主管蒙、回、藏各族领导阶层参加的朝觐、朝贡、围猎等朝仪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功能。这些朝仪首先使清朝皇帝与长城外各地方民族领袖有频繁的面对面联系，这些领袖们对皇帝邀请参加朝廷年节、婚宴等重大事件的庆祝活动，加强了双方的亲情关系。同时朝觐朝贡的政治要求，(如朝仪程秩中所表达的尊卑地位，清廷对参加者的法律和政治约束等)作为清代边疆地方管理的组成部分，规定着地方官对朝廷的臣服。清朝所创立的围猎仪式则进一步以清帝为游牧族生活方式代表的姿态，对蒙、回、藏各族起着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聚合作用。在宗教事务上，理藩院对清廷宗教政策的颁行，在精神生活上沟通着清中央统治者与边疆地区人民的联系、理蕃院管理中对民族语言的教育及这种教育对科举制度的参与(如科举中的满汉翻译等)，造就了可观的政府语言专职工作队伍，使跨语言文化的文书传递、政令下达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有相当的效率，同时促进了各族文献的多语种翻译所带来的文化沟通。理藩院的经济功能，在边疆地方通过划界游牧、设仓储粮、赈贫济灾，与内地交换、贸易等措施，稳定了游牧地区的经济生活，同时把游牧经济逐步纳入全国的经济系统，形成有一定规划的农牧区经济互换。通过理藩院各方面功能的综合作用，清廷在汉族与其他各族传统交往的基础上，把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固定了下来，并开创了在政府中有管理民族事务特设机构的先例。消除以长城为界的农牧社会间的战争与隔阂，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如今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清代前期成为巩固的现实。

从清代前期的民族政策以及理藩院对这些政策的实行，可见产生于长城外游牧文化和社会的满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贡献。这一历史事例，有效地支持了近年来研究游牧社会和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即游牧文化并非传统观念中原始的、落后的、与文明方式无关甚至对立的文化形态。作为由生态环境所决定，并由这种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人们所选择的一种特殊的生活和经济方式，游牧文化可以对农业文明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这一点上，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学中的边疆理论，也即是农牧关系理论的探讨和回顾值得介绍。由于 Owen hattimore 的学术成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对他的研究成果的重新探讨已成为发展中的清代边疆学的一部分，此文对这种探讨和回顾集中于对 hattimore 边疆研究简要的评价。

三、对 Owen hattimore 边疆研究的回顾与修正

Owen hattimore 毕生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发表了 16 本著述并有众多的文章。其中最初发表于 1940 年并于 1988 年再版的《内亚大陆的中国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有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随着清代边疆学的兴起，遭冷落多年的 hattimore 研究成果重新受到美

国学者的重视，他今天仍被视为美国中国学中满、蒙、回、藏及俄国中亚研究的杰出学者。他探讨游牧文化及定居文化与社会之关系的成就，被视为具有“持久的价值”。因而对 hattimore 边疆学的研究本身成为一门专题。

hattimore 边疆问题探讨的独特贡献之一，是他在整个学术界关于农牧关系的研究中完全以农业文明为中心，并以农业文明中的都市和政府体系为重点的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种边疆观点，或叫游牧文化观点。他以这种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认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理解，不能忽视中国的边疆，因为边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他视游牧文化为内亚大陆的一种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介乎农区与牧区之间或内地与边疆区域之间的边缘地带。长城内外两种社会的发展总有一部分历史事件与这个边缘地带相联系。他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给我们以如下启示：中国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生活在这个地带中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他们既濡染长城内汉文化，又濡染长城外游牧文化。他们是帮助非汉族统治朝代获得生机、巩固跨长城统治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获得于跨文明的统治方式，即不固守农业或游牧文明的单一方式，而把两者相结合。由于游牧族社会与农业的汉族社会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共生现象”，游牧族的历史反过来也与汉族的农业文明有不解之缘。因而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国家关系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游牧族在长城内建立政权后，汉族又恢复自己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循环。每经一周循环后，双方都在更广阔的地域上把对方的区域视为统一帝国的领土。中国的疆域由此越发展越辽阔，中国的民族越容纳越众多，农牧两社会的各民族都对今天中国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清朝建立跨农、牧两文明统一国家的实践，使这一历史循环的成果推向顶峰，作为长城外民族建立的朝代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朝代，满族在这一历史循环中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

hattimore 这部分边疆研究的启示，可以反过来修正 hattimore 在其他部分不成熟的观点。例如，他在对纵贯中国史前史至 20 世纪初的研究中，忽略了清代前期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环节。他的结论既没有考虑满族统治对长城外聚合力的作用，也没有考虑这种聚合力对清代前期内地边疆空前大统一的必然性，因而他只用清末民初边疆地区的现状一味地批评清朝的边疆政策。

由此可见，对 hattimore 中国边疆研究的重新探讨，既可以给如今的边疆研究增加动力，又可以在修正由历史条件所限而不准确的结论中，把边疆研究推向新的深度。

四、总结

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长久的历史过程，由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对这个历史过程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清代的边疆业绩是这一贡献中的杰出部分。

自秦汉以来，中国各王朝都力图解决边疆问题。消除隔阂与对立并达成统一，成为一项艰巨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在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短暂地得到了实现，在满族建立的清朝确立了长久性的根基。经历了清代前期的空前大统一之后，中国人民对边疆作为民族的区域和政治的概念都形成了现代式的理解。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强调的民族团结和统一，都无不与清代前期的历史实践紧密相关。由此而言，1644 年满族入关历史事件不仅只对有清一代意义重大，我们今天也仍然生活在这个历史事件的延续之中。